

关于中国哲学史课程改革的几个问题

終 則 始

我们在教学改革运动中，对几年来中国哲学史课程的教学指导思想及部分自编讲义，进行了集体检查。带着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我们重新学习了毛主席著作，系统回顾了建国以来特别是1957年以来哲学战线和史学战线上的斗争。我们逐步认识到，适应当前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新形势，哲学史教学必须进行重大的改革；而改革的关键，首先是以毛泽东思想为纲来端正教学指导思想，从而使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的改革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稳步前进。同时，我们也深深感到，对于以往教学指导思想上存在的问题以及教学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必须同几年来哲学史阵地上“兴无灭资”斗争的经验教训历史地联系起来考察，一分为二地加以总结。

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首先要敢于自以为是，就是要不断地“检查自己背上的包袱，把它放下来，使自己的精神获得解放”^①；同时还要善于一分为二，就是要以“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②来分析和总结以往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惩前毖后，使革命工作不断地向前推进。

我们的课程改革，还仅仅是开始；对教学指导思想的检查和讨论，也还不够深透；仅就初步总结以往教学工作发现的几个主要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看法，恳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指正。

一、关于中国哲学史教学的目的性问题

1959年我们开始了这门课程的建设。当时，我们首先认真总结了1957年以讨论中国哲学史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哲学战线上的激烈斗争，认识到中国哲学史研究确实不是一个“古战场”，而是一个“今战场”，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中两军对战的一个重要阵地。因而，我们着手自编教材时，基本上坚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史必须成为无产阶级手中的战斗武器，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在教学内容上，注意了对历史上反动思想传统的批判，注意了对维护这种反动思想传统的资产阶级伪科学的哲学史进行必要的揭露和斗争。当时认为，哲学史课程的任务，就在于引导同学了解在哲学史研究领域中还存在着复杂的阶级斗争，各种腐朽意识形态的垃圾还需要用大力去扫除。

几年来，在教材建设和教学实践的过程中，一方面，由于上述对课程任务的理解，局限于比较狭隘的视野，更由于对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和新特点缺乏认识，基本忽视了哲学史教学在为无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战略任务中应起的作用；另一方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12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上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34页。

面,又由于教学指导思想上存在问题,对资产阶级的教学质量观与学术质量观的影响不善于识别和抵制,主要表现在:智育第一的思想指导下,片面地理解“工农知识化”的任务,不适当地夸大了“史”的教养作用;在教学和研究中逐步滋长的厚古薄今的学术倾向,未得到及时克服;追求所谓“藤瓜并举”的教学体系和“深广全新”的教学质量,使内容日趋庞杂、烦琐,严重脱离实际。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中国哲学史的教学活动,违反了“少而精”的教学原则,影响到培养目标的全面实现。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很多,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毛泽东思想没有在教学指导思想上真正生根,没有真正贯彻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一纲领性文件中所指示的思想原则。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必须把研究现状、研究历史和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运用这三方面的学习任务正确地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去调查研究现状和批判地总结历史,都必须采取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的态度,时刻注意当前运动的特点,服务于革命实践的需要。把这个思想原则具体贯彻到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来,首先,在指导思想上就必须**面向现实、立足于当代**。

所谓“立足于当代”,就是要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现实需要出发,切实贯彻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方针。在教学内容上,应该把与当前运动联系密切的近代和现代部分作为教学的重点,古代部分也要把历史批判和现实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在教学方法上,应该从人体的解剖去找出猴体解剖的钥匙,通过对当代哲学战线的调查研究提供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的方法论原则。

所谓“立足于当代”,就是要求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高度,以这样一个最高的理论标准作为立足点,去分析、评价和总结以往的哲学发展史。应该十分明确,我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去阐明哲学史上真理同谬误相斗争而发展的规律,就是为了更好地宣扬在当代哲学斗争中发展着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真理。这应该是哲学史教学和研究的根本目的。

通过重新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检查总结以往教学指导思想,我们深切地感到,必须彻底克服以往教学中脱离政治、厚古薄今的倾向,坚决树立“面向现实、立足于当代”的思想原则。我们面临的现实是:国内外敌人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对我们的进攻;高等学校和整个文教战线一样还严重存在两个镪炉、两条道路的斗争。“史”的教学,在阶级斗争新形势下更是一个激烈争夺的阵地,或者是成为无产阶级的斗争工具,自觉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就必须高举革命的批判的旗帜,“破除迷信,厚今薄古,打破旧传统,粉碎资产阶级伪科学”,致力于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或者相反,按只专不红、厚古薄今的方向,培养书呆子和精神贵族,适应资产阶级歪曲利用文化遗产、进行复辟活动的需要。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

革命形势的发展,促使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从教学指导思想上破旧立新;结合当前教育革命的总任务,按照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根据中国哲学史课程的特点及其在专业教学计划中的地位和作用,重新明确**课程任务**和**教学目的**。我们认为,以下三个方面,值得今后努力:

(一)中国哲学史,作为专业基础课,同样地必须从全面实现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出发,结合教学进程,解决同学“兴无灭资”的某些活思想问题。它的特殊途径,是通过系统批判历

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传统,清算地主、资产阶级各种腐朽反动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的遗毒,以促进师生提高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同一切旧思想、旧观念、旧传统实行彻底的决裂。

(二)利用文化遗产,争夺青年一代,是当前没落资产阶级及其修正主义助手实行“和平演变”的一个重要手段。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他们还往往利用新形式、乃至披起马克思主义词句的外衣来散布旧思想,腐化新事物,为旧制度的复辟开道。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应充分揭露他们借尸还魂、移花接木的各种手法,对历史上具有典型性的主观唯心论、矛盾调和论、庸俗进化论、超阶级人性论等,联系实际地进行重点批判;用历史上哲学斗争依存于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知识武装同学,并善于引导他们注视当前哲学战线上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锻炼提高他们识别香花、毒草的能力,逐步学会在学术理论斗争中辨风向、插红旗的本领。

(三)“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根本任务。“立足于当代”的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必须把“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原则落实为教学体系的根本改造,加强近现代,扩展“今战场”,直接服务于总结和研究当代哲学斗争的新经验和新问题。对旧哲学进行历史的批判,根本目的在于更深刻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一切旧哲学的根本对立和质的区别,因而,这种批判,特别是对批判者的批判,应当有助于同学树立和巩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有利于更好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战斗红旗。

我们认为,中国哲学史教学指导思想的革命化,关键在于认真贯彻毛主席关于历史科学的任务的指示,把“面向现实,立足于当代”的原则在课程改革中具体落实。这是我们总结经验所得出的结论。与此相比较而存在的,是坚持“面向过去,立足于古代”的原则。当前有人主张“研究历史,就是把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推进到历史的领域,就是在历史领域内干革命”;

“研究中国哲学学史,就是要把无产阶级革命推进到过去几千年的中国哲学界,具体地说,就是对于它进行批判。……也就是给过去的哲学界作新的论定。过去的哲学界是已经‘盖棺’了,但是它的‘论定’也要无产阶级去作。”^①这一主张引导的方向值得注意,因为它把哲学史的任务,规定为“到过去几千年的中国哲学界”去“干革命”;而所谓到过去的哲学界中去“干革命”或“进行批判”,又被规定为只是去给早已“盖棺”的古人一一作出“论定”。这就是说,无产阶级的历史科学不必参加现实的“兴无灭资”的革命及当前哲学界的斗争,而只能去“整理国故”,到故纸堆中去“开刀”,去革死人的命。当然,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重新评价古人,科学地整理历史遗产,但其目的是在批判旧事物中创造新事物,在批判旧世界中创造新世界,引导人们向前看。因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批判,必须有的放矢地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斗争;清算过去,是为了改造现实的世界,开拓历史的未来。如果把历史研究和哲学史研究,理解为应当面向过去,立足于古代,只是去对古人作“盖棺论定”,把历史科学的任务变为历史档案保管员的工作,这就必然会取消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党性。关于历史研究任务的这种“盖棺论定”说,是资产阶级所谓“客观的历史编纂学”的新变种,其实质在于提倡面向过去、反对面向现实,提倡“加入”古战场、反对

① 《新建设》1965年第7期,第42—44页。

立足于当代,提倡今为古用、反对古为今用。这条史学路线,我们当然必须反对。

二、关于对待哲学遗产的态度问题

对待哲学遗产的态度和批判继承哲学遗产的方法问题,是几年来哲学史阵地上两军对战的一个争论的焦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中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几年来,我们在中国哲学史的教学活动中,正确地坚持了列宁和毛主席关于区分两个传统、两种民族文化、两条哲学路线的基本观点,注意了在清理哲学遗产中要分清精华和糟粕;对于历史上各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注意清算其留下的思想遗毒;对于封建、买办学者和资产阶级学者维护唯心主义传统、敌视唯物主义传统的学术路线,以及他们利用哲学遗产来偷运和贩卖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思想毒素的手法,进行了必要的揭露和斗争。

但是,我们在处理哲学遗产问题上,由于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贯注于课程内容中的教学指导思想,产生了一种对待唯物主义思想传统肯定过多、批判不足的思想偏向。以下两个问题,是值得吸取的主要教训。

一是关于“维护传统”的问题。为了同资产阶级学者维护和颂扬唯心主义传统的“高调论”(也就是有意贬低唯物主义传统的“低调论”)相对立,我们在教学和研究中,注意了维护祖国唯物主义优秀传统文化,但是,在有些地方,对历史上唯物主义传统又作了过多的肯定和不恰当的颂扬;满足于划清历史上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界线,而对于旧的唯物主义的批判,则不深不严,乃至在某些具体观点上模糊了旧唯物主义同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界线。例如,对于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观点和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的观点,在论述中就有些夸大其理论贡献,似乎他们已认识到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又如,对于司马迁、柳宗元、王夫之的历史观,也评价过高,在论述中似乎认为他们已具有“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在一些地方,正确地肯定了旧唯物主义传统在昨天、前天所起的历史进步作用,却又忽视了旧唯物主义及一切传统思想在今天已经和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

一是关于“挖掘精华”的问题。为了反对资产阶级学者长期鼓吹的以西方中心说为核心的“中国哲学遗产贫乏论”,我们在教学和研究中,曾经强调要挖掘历史遗产中的精华。被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偏见所掩埋了的历史上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及其光辉贡献,当然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评论来恢复其应有的历史地位。但我们在论述和表彰这些思想家的贡献时,由于着眼点是“披沙拣金”,挖掘精华,因而对祖国哲学遗产中这些“珍贵品”,有时就放宽了尺度,没有采取一分为二的严肃批判态度。例如,对于王充和王夫之的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理论及其中所包含的辩证法因素,在分析评价时不仅肯定多、批判少,乃至把他们关于认识深化的观点,过高地估计为“正确地避免了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形而上学泥坑”。对有些进步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进步的一面讲得多,落后的一面讲得少;理论贡献讲得具体、全面,阶级局限则讲得抽象、简单;在论述其理论贡献时,把某些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的萌芽形态的东西,又不恰当地夸张为成熟的形态。这就在客观上表现了抬高古人的倾向,乃至同当时某些学者把古人思想现代化的错误倾向划不清界限。

对旧唯物主义传统批判不严,对遗产中的精华忽视一分为二,都表明我们以往在对待历

史遗产的态度上存在着重继承、轻批判的错误倾向；而在批判继承精华的方法上则表现了形式主义向右发展的倾向，这种倾向与形式主义向“左”发展的倾向属于同样的思想方法，都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这种错误倾向必须严肃纠正，否则在哲学史教学中就不能深刻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所引起的空前大革命的实质。忽视或低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一切旧哲学的否定和终结，片面强调其对以往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优秀成果的综合和总结，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现是人类哲学发展的“渐进过程的中断”，讲成似乎是“滚雪球”式的集其大成。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背离革命辩证法，使哲学史的教学失去无产阶级的党性。

为了吸取教训，提高认识，我们带着以上的问题，重新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对待历史遗产的重要指示，深切地感到有关这些问题，毛主席早已有明确指示，问题在于我们世界观的改造不彻底，阶级感情的变化不彻底，所以往往不能全面领会，知其一不知其二。有些问题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但真理往前多跨一步就变成了谬误。有些教训是用一个片面去克服另一个片面，结果走到了自己的反面。这次带着教学指导思想上的实际问题，有的放矢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得到几点主要收获：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历史遗产必须树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思想。毛主席曾经指出：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特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思潮在中国不是从继承与改造自己哲学的遗产而来的，而是通过十月革命的炮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来的。但是，要使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深入与发展下去，并确定地指导中国革命走向彻底的胜利，就必须同中国现存的各种反动哲学思潮作斗争，在全国思想战线上树立批判的旗帜，并因而清算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这里，指明了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清算整个哲学遗产，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的重要方面。一方面，无产阶级要发展自己的科学世界观，实行彻底的文化革命和思想解放，就必须厚今薄古，破旧立新。“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要磅礴于全中国，一切旧哲学就必须通通都送进历史博物馆。哲学遗产中的精华，是历史上的思想高峰。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以前，人类哲学的发展事实上还处于低级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宣告了一切旧哲学的终结，开辟了哲学发展的新纪元。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从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的峰顶回顾以往的哲学遗产，一切“活老虎”都已变成了“纸老虎”，当然只能从战略上给予充分的藐视。另一方面，毛主席又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批判地总结和继承历史遗产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且取得一定的民族形式，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服务于当前的革命运动，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尊重历史的辩证法，引导人们向前看。^①这又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必须在战术上给予充分的重视。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向前发展，这种对历史遗产的批判总结还必须不断地深入进行。而只有在革命的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每一革命阶段上每一方面的批判继承遗产的具体战斗任务，才能很好的完成，才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其次，毛主席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针，哲学史工作当然不能例外。在处理哲学遗产问题上，批判继承的范围和重点，区分精华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496—497、679页。

和糟粕的标准,都应该适应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有所变化。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比起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在性质和内容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断发展的不同阶段,文化思想革命的广度和深度也有所变化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反对一切剥削阶级世界观的斗争,要求同一切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在批判和清算哲学遗产问题上,也就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我们的教学指导思想,还停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加批判地把解放前三十年代或四十年代学术战线上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批判水准,搬到六十年代的今天,并用以教育未来的哲学战士,显然就会脱离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时代要求,就会在一些问题上界限不清,处理不当。我们以往工作中的教训,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毛主席关于革命文艺发展的“源”和“流”的问题的论断,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同批判继承哲学遗产的关系问题,过去是若明若暗的。由于片面理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任务,在教学和研究中曾经强调要在中国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的优秀传统中去追溯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和“思想土壤”。显然,这是夸大了批判继承哲学遗产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用,混淆了“源”和“流”的界限。毛主席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① 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是正确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唯一源泉。历史上的哲学遗产,即使是精华,也只能是“流”而不是“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只能以概括和总结当代人民群众三大革命实践为基础;批判地继承哲学遗产,总结以往哲学斗争的历史经验,只可能起着借鑑的作用。当然,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有这个借鑑和没有这个借鑑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但是继承和借鑑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② 不弄清这个“源”和“流”的关系,也就很难正确理解批判的继承和新的创造的辩证关系;在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就难免会犯引导人们向后看的方向性错误。

最后,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处理哲学遗产,还必须把批判和继承、否定和肯定具体地历史地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本身就包含着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也就是要推陈出新。当前,社会主义文化思想革命正向纵深发展,在哲学史教学和研究中必须把批判精华的任务,放在首要地位。这是因为,历史遗产中的精华,是以往先进思想家对真理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历史上的批判者对当时反动统治思想的批判,是在昨天或前天起过进步作用的东西,一般人对它们还多少有些过了时的迷信;但历史的车轮已进到社会主义时代,它们大都已变质为落后、乃至反动的东西。因此,服务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和人民群众思想解放的需要,越是精华,越需要批判,不加以批判,它们就会成为混着蜜糖的毒药。立足于社会主义时代、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的哲学史研究,必须对以往一切批判者的批判,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再批判。在批判中去消化这些遗产,使其真正起到借鑑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统一,实现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在如何继承遗产和对待精华问题上,有人主张“抽象继承法”,最近又提倡同古人搞统一战线,即主张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同历史上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和进步思想,在求同的基础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5年版,第251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66—267页。

上建立又团结又斗争的统战关系。^①我们认为,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分析的文化统一战线问题,是指的现实的斗争和思想斗争中的敌、友、我的关系问题。这种现实的关系并不能推广到历史研究中来处理我们和古人的关系。如果那样,只能是幻想的同一性。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过去的一切剥削阶级哲学的思想关系,是不破不立的对立关系。对于一切旧哲学,我们的任务,首先是同它们划清界限、彻底决裂,即使是遗产中的精华,也必须加以否定和改造,推陈出新;而不是去搞什么“求同”基础上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只能向未来汲取诗情,决不求助于过去的亡灵。所谓无产阶级的“我”要“加入”到过去的哲学界中去搞统一战线,无非是要无产阶级去“团结”古人、召唤亡灵来帮助自己进行哲学革命。这实质上是用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来混淆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用资本主义的文艺复兴来混淆社会主义的文艺复兴。我们当然不能同意这种观点。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工作对整个哲学遗产的清算,目的在于“让死者去埋葬他们自己的死者,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②

三、关于揭示哲学发展规律的方法论问题

哲学史的根本任务,是要揭示历史上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相斗争而发展的规律,以服务于现实的革命斗争。要正确地揭示出哲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就不能离开正确的研究方法。

在哲学史方法论上,我们曾经概括出“一个基础、两条红线”的主张,即在分析批判任何一种哲学思潮和哲学体系的产生、形成或消亡时,必须遵循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则。同时,注意考察当时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具体实践,对于哲学斗争发展的制约作用;这两种社会实践,特别是阶级斗争的实践(在封建社会中主要是农民革命战争),是分析哲学斗争时应着重抓住的红线。我们在教学中,关于长期封建社会哲学史的分期问题,哲学学派的阶级分野问题,哲学思想的阶级性格问题,都力图贯彻上述观点,运用阶级分析方法,作出自己的说明。

但是,在这些说明中,由于我们对不同时期哲学斗争如何反映和如何服务于阶级斗争的复杂问题,作了这样或者那样的简单化的理解,以致某些地方曾背离了阶级分析方法。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探索哲学斗争、转化的规律时,片面强调哲学运动的内在矛盾,致力于探索“哲学认识发展的圆圈”,认为由此可以说明哲学认识由低级到高级螺旋前进的规律性。例如企图从哲学体系的内在矛盾,去说明后期封建社会中张载的唯物主义气一元论,如何经过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理一元论等,发展为王夫之的唯物主义道器一贯论。这样,不适当地夸大了哲学斗争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忽视和模糊了社会阶级斗争是哲学发展的根本动力。

其次,在解剖封建社会某些进步思想家的哲学思想时,强调所谓“三客观”的思想分析,即强调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是旧唯物主义哲学发生发展的客观动力,而忽视

① 《新建设》1965年第7期,第47—50页。

② 参马克思:《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4页。

思想家本人以其哲学思想服务于本阶级政治经济利益的主观意图；强调旧唯物主义哲学的某些客观内容根源于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和斗争智慧，而忽视了通过哲学家改造制作出来的哲学思想都必然是它所属阶级的阶级政策的特殊形态；强调旧唯物主义在反对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时，对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会产生有利的客观作用，而忽视它从不同角度维护封建纲常，对劳动人民必然具有欺骗性和反动作用。在这种片面的思想分析的方法指导下，曾经把封建时期的某些进步思想家，王充、范缜、柳宗元、王夫之等，不作深入的具体的阶级分析，统称为“地主阶级政治反对派”，一律看作“封建等级压迫下广大人民的代言人”，着眼于这些思想家在哲学斗争中的进步作用和理论贡献，而忽视其哲学思想所必然具有的剥削阶级的阶级局限和阶级偏见。这样，强调某些哲学思想的民主性和人民性，以至漠视其固有的封建性和阶级性。

通过这次检查和总结，我们认为在中国哲学史教学和研究中，必须突出政治，以阶级斗争观点为纲，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由于哲学是远离物质生活、高高凌驾于空中的思想部门，它同经济基础不是直接联系的。“在这里，观念跟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混乱，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①特别是有些统治阶级的哲学思想，采取虚伪的“思想的普遍性形式”表达出来，容易造成超阶级的假象。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史工作者必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②。这就是说，哲学史的研究，必须坚持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一切思想的发展，解剖一切思想的阶级烙印。“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个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③既没有超阶级的哲学，也没有某几个阶级共同的哲学。这是马克思主义不可动摇的原则。复杂交错的社会矛盾，可以使某一阶级或某一阶层的哲学思想具有矛盾性，这恰好反映了它的阶级地位的特殊性。哲学史科学的任务，正是要对各种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哲学思想，进行具体分析，还原其固有的阶级属性，揭示其特殊的本质。

其次，哲学的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转化有其特殊的规律。哲学发展的这种“独立的外表”，易于使人脱离社会存在来分析作为社会意识特殊形态的哲学，脱离阶级斗争的逻辑来分析哲学斗争的逻辑，这就会把“哲学发展圆圈”的相对独立性，夸大为绝对的独立性，脱离阶级斗争的全局去单纯地探索所谓人类哲学认识由低级到高级的螺旋上升的规律性。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史工作者必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④根源于社会经济矛盾的阶级斗争，是人类文明史的基本矛盾，它决定着一切意识形态的斗争；而哲学斗争，又不过是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决不能离开阶级斗争的规律的普遍性来分析哲

①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上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5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91页。

学相对独立发展的规律的特殊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即存在于哲学发展的特殊规律之中,哲学斗争的逻辑只能依存于阶级斗争的逻辑。这是在哲学史研究中必须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前提。就方法论的意义说,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不能作任何割裂的理解。在哲学斗争、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既包含了社会阶级关系的矛盾的普遍性,又包含了社会思想关系的矛盾的特殊性。哲学史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如实地揭示这两个方面及其互相联结。

第三,任何哲学都有其实践基础。它的内容,是处于不同阶级地位的思想家对于来自人们生产斗争的自然知识和来自阶级斗争的社会知识的总结和概括,并反过来对人们的社会实践发生指导作用,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武器。在阶级斗争中,不同的阶级从各自的阶级利益出发,对人们的实践经验作出不同的哲学概括,或者是科学的、革命的概括,或者是反科学的、反革命的概括。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时期,新旧阶级的矛盾冲突在哲学战线上的反映,阶级分野是比较清楚的。但是在同一生产方式中生产关系的相对调整时期,既表现为剥削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对立斗争,又表现为统治阶级中新、旧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哲学战线上的反映就表现为比较复杂的情况。例如,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与封建正宗神学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异端”思潮,即具有各种不同的阶级性格。这就要求我们,对哲学斗争怎样通过各种中间环节折射出各种阶级关系、阶级矛盾,要作深入的解剖;正确区分封建社会中的基本矛盾和非基本矛盾,正确处理封建剥削关系和封建等级关系之间的主从关系,正确认识地主阶级政治反对派的改革主张和劳动人民的革命要求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从而,对封建社会中唯物主义和进步思想的承担者,要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如实地揭示其思想的二重性,把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坚决贯彻到底。毛主席关于阶级社会中真理发展规律的科学概括^①,关于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都具有二重性的科学分析^②,对于我们揭示阶级斗争反映为哲学斗争的历史规律,是唯一正确的方法论的指导原则。

总之,我们认为,只有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全面地具体地贯彻阶级分析方法,才可能真正揭示哲学斗争依存于阶级斗争的发展规律,正确总结哲学斗争服务于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从而在古为今用的原则指导下,具体地实现哲学史教学的目的。

× × × ×

以上几个问题,仅是我们在初步总结工作中重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初步体会。我们清醒地估计到,适应社会主义文化思想革命的新要求,中国哲学史课程的指导思想和教学体系的根本改造,还需要我们进行长期的、艰苦的、集体的努力。但我们确信,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加强自我改造的原则下,只要我们坚持中央指示的教学改革方针,勇于走自己的路,善于学诸家之长,破中求立,推陈出新,我们一定能够在中国哲学史阵地上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

1965年6月初稿、9月改定。

① 见《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77—478页。

② 1958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0页。